

身心障礙者需要更多的接納與尊重

高雄長庚社服課社工師 龔千逢

有時在診間進行身心障礙鑑定時，我常常會很直接地問病人一個問題：「在處理自己健康的問題會不會覺得花掉很多時間」，大多數病人的第一個反應是點頭大聲附和，覺得真的花太多時間等看診、等做檢查、等看報告。什麼都等很麻煩，但極少數的人會跟我說他還蠻喜歡來醫院的，不是詛咒自己的身體狀況不好，而是「來這邊會有人肯聽他們說話」，這其中一部分的人通常會是聽力障礙的病人。

聽力障礙的病人受限於疾病的關係，很多時候與人溝通的基本條件沒有了，自己也就相對顯得封閉，一部分是因為自卑感受的浮現，一部分是來自於旁人的誤解。聽障的病人很常描述自己的狀況就是：別人說什麼自己聽不到，只要再追問一下就會被罵說是聾子嗎？為什麼這麼大聲還聽不見！這樣的話語雖然有時候是家屬或朋友的無心之過，但總是讓病人們心理上有相當程度的受創，因而封閉自己，聽不見就聽不見，也開始較少與人有交流，他們說：「至少那些針鋒相對的言語自己就不用聽進去」。

在這樣的感受之中，助聽器這項輔具的出現，無疑是聽障病人的一大福

音，透過輔具他們可以重拾與旁人順利交流的機會，但在這幾次的觀察下，我發現也因為輔具的關係，讓他們在用與不用之間矛盾不已。

一部分的病人在助聽器的幫助下重拾與家人朋友的交流，從他們笑顏逐開的面容可以看到這樣的欣喜。但另一部分的病人因為怕被看到自己正使用著「助聽器」，而在原先就被貼上所謂「聾子」的標籤上面再貼上「嚴重」的標籤，所以很少有聽障朋友願意長時間帶著助聽器，原因除了不適應之外，更多是來自低自尊。

前些日子我評到了一個大學剛畢業不久的小女生，一進診間就不由自主嚎啕大哭，陪同的媽媽跟我說道，雖然過了很久，但她女兒還是無法接受自己雙耳失聰的事實，小女生在安慰之後心情平緩，邊啜泣邊戴上助聽器準備進行鑑定，但詢問到生活適應的相關問題時，又再次崩潰。她說她沒有讓人知道，所以除了家人之外她周遭的朋友還不知道她失聰，她的長髮再也不繫成馬尾，也是因為放下頭髮才能遮蓋住助聽器以防被別人看到，也能較安心的戴著與人進行交談。看著她聲淚俱下的描述，我也

不禁心疼。因為身體疾病帶來失聰的後遺症加諸在她身上，但她卻不能因為輔具的協助，而能讓自己的生活壓力獲得釋放，反倒是因為這樣，她被囚禁在這樣的心靈囹圄之中

聽障不能型塑個體的情緒及社會發展，但卻能充分影響。而生活周遭其他人的態度對於聽障病人的影響更尤其深遠。最近有個伯伯來讓我進行鑑定，還沒申請助聽器的他希望我可以把問題盡量說大聲一點，因為他想盡量回答，於是，過程中我便扯開嗓子跟他對談，我順著一些問項跟他談了好多他的生活，伯伯相當地健談，很專注的聽我問的問題，很仔細地一一回應。當談到與家人的相處的時候，他很淡然地說道：「沒人理我啊，因為他們覺得跟我說話我也聽不到不如不說」。一旁陪診的太太很是尷尬，連忙說因為跟他說話都必須很靠近耳朵然後還要非常大聲他才能聽到，所以跟他對談的人其實很累。伯伯隨即跟我說：「我很感謝你，因為你是這幾個禮拜唯一一個願意聽我說話、肯跟我聊天的人」，聽到這句話我鼻頭一酸，望了伯伯一眼，那種長時間無法與人交流的孤寂感竄滿他全身，伯伯說過他以前是個很喜歡聊天的人，卻因為聽力的關係逐漸被忽視，

進而演變成現狀的封閉自己。他說：「這是一種難以言喻的苦，因為別人就是這樣看待你了」，當社交需求無法被滿足，病人常常會自我轉化成退縮封閉，進而疏離。我記得有一位類似情況的病人，我問他接下來會申請助聽器嗎？他回答：「會是會，但我不曉得申請來有什麼用，反正也沒人要跟我聊天或聽我講話」。

因受到病症的限制，病人在情緒面和行為面上都很容易受到改變和影響，甚至有較為負面的自我概念出現，進而導致人際互動、社會支持和社會關係產生退化或是薄弱，進一步導致社會功能的影響，不管生理上或心理上皆造成了損傷和動盪。這樣的過程亦足以使他們在生活之中背負極大的負荷，也因為這樣限制了拓展自己生活範圍和社交圈，及改變、控制自己生活的可能。臨床上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生理的損傷影響病人個體行為和心理社會層面的問題，但除了讓障礙者接受自己超脫障礙，更重要的還是需要努力去傳遞相關支援和協助，這樣的協助包含社會大眾的態度。

這讓我想起某位前輩分享給我的一段話：「某些病人確實需要輔具的協助，但更需要旁人的尊重、接納、關心與支持。」

105 年器官捐贈與大體老師追思大會

為向歷年來捐贈器官和大體者，其遺愛人間、貢獻醫學研究之善行表達追思感恩之意，105年3月26日（星期六）下午3點，假長庚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器官捐贈與大體老師追思大會」。大會將邀請器官受贈者代表、學生代表致詞感恩追悼，並有長庚大學弦樂社及曉韻合唱團於會中表演。會後，所有與會者將前往「遺愛人間」紀念牌獻花，傳達後人對他們遺愛人間精神最崇高的敬意與懷念。